

与周氏兄弟相遇

陈平原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钱理群 著

与周氏兄弟相遇

复旦大学出版社



陈平原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周氏兄弟相遇/钱理群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8
ISBN 978-7-309-07387-4

I. 与… II. 钱… III. ①鲁迅(1881~1936)-人物研究②周作人(1885~1967)-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2328号

本书原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的“三联人文书系”之一种,以书名《与周氏兄弟相遇》出版,现经由原出版公司授权复旦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内地出版发行。

与周氏兄弟相遇

钱理群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卢 茗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5.125 字数117千

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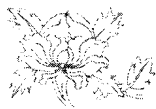
ISBN 978-7-309-07387-4/K·290

定价: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本丛书原为陈平原先生应香港三联之约编就，并于2008年在香港出版繁体字版，反响颇佳。因为发行等方面的限制，丛书少为大陆读者所见，实在是一个不小的缺憾。蒙香港三联授权，我社今特推出简体字版，但愿对大陆读书界是一种补偿。

陈平原先生曾为本丛书香港三联版撰有总序，略述丛书的编选宗旨和出版的因缘际会，无不精妙绝伦，现移用原序中若干隽语，以为简体版弁言，希望于读者诸君有所助益。

“与当今中国学界之极力推崇‘专著’不同”，陈平原先生坦言：“我欣赏精彩的单篇论文；就连自家买书，也都更看好篇幅不大的专题文集，而不是叠床架屋的高头讲章。前年撰一《怀念‘小书’》的短文，提及‘现在的学术书，之所以越写越厚，有的是专业论述的需要，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剪裁，以众多陈陈相因的史料或套语来充数’。外行人以为，书写得那么厚，必定是下了很大工夫。其实，有时并非工夫深，而是不够自信，不敢单刀赴会，什么都来一点，以示全面；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眉毛胡子一把抓，才把书弄得那么臃肿。只是风气已然形成，身为专家学者，没有四五十万字，似乎不好意思出手了。”

关于该丛书的编选，作为主编的陈平原先生认为，“与

其兴师动众，组一个庞大的编委会，经由一番认真的提名与票选，得到一张左右支绌的‘英雄谱’，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这既非学术史，也不是排行榜，只是一个兴趣广泛的读书人，以他的眼光、趣味与人脉，勾勒出来的‘当代中国人文学’的某一侧影。若天遂人愿，旧雨新知不断加盟，衣食父母继续捧场，丛书能延续较长一段时间，我相信，这一‘图景’会日渐完善”。

关于丛书的编选宗旨，陈平原先生有三点说明：“第一，作者不限东西南北，只求以汉语写作；第二，学科不论古今中外，目前仅限于人文学；第三，不敢有年龄歧视，但以中年为主——考虑到中国大陆的历史原因，选择改革开放后进入大学或研究院者。”

于今，陈先生的宏愿，经由我们的“加盟”和大陆读者的捧场，可以说已部分得以实现；无论如何，为中国学术的繁荣做点传薪的工作，也是复旦出版人的志趣所在。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7月

小序



回顾我的人生轨迹与治学之路，最有意义的，大概就是和周氏兄弟——鲁迅与周作人的相遇。

早在中学时代就读鲁迅作品，在大学期间，又把新出版的《鲁迅全集》通读了一遍，但许多地方都读不懂。真正读进去，并且有了自己的体会，是在“文革”后期。中国与自己都走到了绝境，在极度的苦闷中，和一群年轻朋友探讨“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向何处去”时，与鲁迅相遇了。我的第一本鲁迅研究专著《心灵的探寻》就是这次相遇的产物，本书第一篇《“多疑”、“尖刻”中的现代智慧》就是其中的一篇。第二次相遇，是在2000年我遭遇了一次全国性的大批判，大病一场以后，又有了一次绝望的生命体验，并且有了《与鲁迅相遇》，这里选了《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这一章。记得在这书的《开场白》里还讲过这样一番话：“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时，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疑惑，甚至感到了绝望，这时就走近鲁迅了。”——这当然只是个人经验之谈。而且我的经验也不全是如此：在我退休以后，又出现了一次研究、言说鲁迅的高潮，也可以说是第三次相遇。但这一次我的心境就很难用“绝望”来简单概括。由于脱离了体制内的大学教授的身份，反倒有一种“胡思乱想，胡说八道”的自由感，思想的视野，精



神的境界，都比原先开阔了许多，也更能以从容的心态和鲁迅对话——当然，内在的忧患也比原先深广了许多。本书的最后两篇就选自退休后出版的《钱理群讲学录》《鲁迅九讲》二书。

结识周作人，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我仅知道他是鲁迅的弟弟，散文写得好而已。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回到‘五四’”那样一个启蒙主义的时代氛围中，我与启蒙主义者周作人相遇了。我从他那里，看到了和鲁迅相通，又是那样不同的启蒙思想、知识结构、言说方式，我有一种发现的喜悦。同时又唤起了我深藏在内心，却又长期被压抑的那些更为温柔、平和、精致的情感与趣味，这样的自我发现，曾一度让我着迷。我可以说是用与写作鲁迅完全不同的心境，去写我的《周作人传》与《周作人论》。我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那是一段“充满了温馨”、“令人怀想的岁月”，“颇有一种自由感与松弛感”，于是就有了几分“洒脱”，几分“从容”（《岁月无情又多情》），这都是可以从那时写的文字（哪怕是学术论文）里感觉得到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似乎是和周作人告别了。在一篇文章里，我曾经解释说，那是因为周作人突然“热”了起来，其实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构造，我不想去“凑热闹”。另一个更为内在的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和世界社会的大混乱、大变动中，我的思想、情感与心境都更趋向于鲁迅，我也更愿意言说鲁迅：我以为这是自己的责任所在。但我仍在内心深处为周作人保留了一个角落，“稍有空闲，即读其书而与之谈，每有所悟，必欣欣然而随手记下”，于是，又在2001年出版了《读周作人》一书，不过，这已是“业余写作”，带有“自我调节、自我发现的自娱性质”（《〈读周作人〉小引·后记》）。出版后好像也无人注意，我自己却不时翻出来看看。本想也选一篇收

入本书，但都是文本细读，于体例不合，只好割爱。

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还开过一门“鲁迅、周作人思想研究”课，整理出《话说周氏兄弟》一书，在青年学生中产生过不小影响。其中一篇谈《有意味的参照》，本也想选入，但由于论题未充分展开，分量不足，也就舍弃了。不过其观点倒无妨在这里说一说。主要是讲了三层意思：其一是强调周氏兄弟思想上的一致性，他们最关心的是“立人”，是“个体的精神自由”，但他们又有各自不同的关注点，不同的领域，有极大的思想互补性。其二，面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他们在价值取向、人格自塑、人生和文学道路上都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代表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两种范式。其三，和屠格涅夫分析的堂吉诃德、哈姆雷特一样，周氏兄弟这两个典型，也“体现着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性，就是人类赖以旋转的两极”，构成了一个文化、精神、人格的共生体，需要作一个综合的把握。

因此，在我看来，周氏兄弟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潜力与前景。我只是占了一个“开始得早”的便宜，所写的这一切，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用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实在是简陋粗疏得很。因编此书，重读旧文，虽不免有些眷恋，因为这毕竟是自己生命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却更感羞愧，乃至沮丧。写到这里，突然想起王瑶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稿》重版后记里，引述了鲁迅的话：“诚望杰构于来哲也。”就学术发展而言，这确实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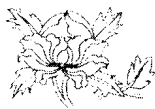
以上所说，都是“学术”与“人”的关系；按主编“总序”里的要求，似乎还应谈及“学术”中的“文”，即“学术文体”的追求。我曾多次说过，自己一身兼任学者与教师，而且把教师看得更重；这样的特殊身份认同，也决定了我的写作方式，大部分文章都是先有提纲，在课堂上讲过以



后，再正式整理成文，这自然也就影响了行文风格，形成了一种“对话体、或演讲体”的“学术文体”。在退休以后，虽然离开了正式课堂，但仍在到处“讲学”，而且因为不是正规上课，也就更为随意而自由，挥洒一种我称之为“随笔式的学术文体”。后来因为研究的需要，重读当年的“胡风分子”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读到他的一句话，不禁怦然心动：“一部学术著作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把寻常的叙述因素和尊严的思辨形成艺术的结合，不仅给人多闻博识，同时给人以深刻和纯真的乐趣”，这正是我所追求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境界，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

2008年6月4日完稿，6月11日补写一段

目录



小序 / 1

“多疑”、“尖刻”中的现代智慧

——鲁迅思维方法论 / 1

周作人的民俗学研究 with 国民性的考察 / 31

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 / 63

鲁迅和北京、上海的故事 / 91

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化 / 133

作者简介 / 151

著述年表 / 152



与周氏兄弟相遇

“多疑”、“尖刻”中的 现代智慧

——鲁迅思维方法论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

——《野草·淡淡的血痕中》

一

对于鲁迅，有一种含有贬义的观察：说他多疑而尖刻。面对着怀有恶意的攻击与并非怀有恶意的批评，我们的一些同志采取了回避态度，或者引用另外一些材料来证明这都是一些误解；据说这是为了维护鲁迅。

其实鲁迅无须维护。为尊者讳，本身就是鲁迅最痛恨的华夏传统之一。鲁迅的伟大正在于，他的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众，让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予以评论，乃至批判——他几乎是唯一可以不加删削、修改地出版全集，而绝不会损害他的形象的现代中国思想家、文学家。

科学研究无禁区。我们应该从事实出发——不是按照预定的观点，经过主观筛选的事实，而是与论题有关的全部事实。

是的，我们可以举出大量的事实证明鲁迅并不多疑、尖刻，相反却是过于天真、过于宽厚了。请读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特别是《鲁迅和青年》那一篇。那著名的“儿子”的故事，是叫人哭笑不得的。许广平由此而发出的感慨，可谓深知鲁迅之言：“谁说先生老于‘世故’，我只觉得他是‘其愚不可及’。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呆子吗？可是这呆气，先生却十分珍贵着。他总是说：‘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

就疑心一切的人。’”¹

鲁迅不赞成“赤膊上阵”。他在与人相处时，也总有所保留，并不赤裸相见²。只有在少数比较亲近、信任的人面前，鲁迅才比较多地显露出自己的真相。读鲁迅给曹靖华、章川岛、胡风、萧军、萧红等人的书信，会强烈地感到鲁迅对人诚挚、直率、宽厚、无微不至的关怀，甚至天真。应该说，这都比较接近鲁迅的真性情。鲁迅摘译的岛崎藤村《从浅草中来》中有一句话：“我希望常存单纯之心；并且要深味这复杂的人间世”，“当混杂的现在的时候，要存单纯的心实在难”。人们大多注意到鲁迅“深味这复杂的人间世”这一面，而往往忽视了也许是更为本质的一面，即“常存单纯之心”。一切站在历史的高峰，看透现实，因而超越现实的伟大人物，必定有“返璞归真”的一面。萧红曾经回忆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³我常想，能够这样放怀大笑的人，一定有一颗纯真的心。

但鲁迅确有多疑、尖刻的一面。

学术界已经多年不谈所谓“‘杨树达’君的袭来事件”，也许是有所忌讳。但这恰恰是最能显示鲁迅多疑、尖刻的真相的。

这是一个崇敬鲁迅而患了精神病的青年学生对鲁迅的突然袭击。鲁迅开始怀疑其疯，以后断定其装疯，感到受骗而生厌恶，乃至认为受到损害，愤怒得不能自制，终于

1 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欣慰的纪念》，收《鲁迅回忆录》（上），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55页。

2 殷夫某次与鲁迅相见时，他的感觉是：“鲁迅话很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以至于很“悔”与鲁迅相见，这表现了殷夫作为诗人的敏感与真挚。鲁迅连忙去信解释：“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80页，下同，不一一注明。）

3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萧红全集》（下），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1125页。



产生最严重的猜疑，作出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最严峻的判断：以为这是在文界、学界的论敌特意派来加害于自己的，遂立即著文公开揭露与反击。但一旦明白真相，鲁迅毫不顾忌自己的地位，又立即连续作文公开“辩正”，表示歉意，万分痛苦地自责“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¹，并愿承担一切损失：“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²从这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鲁迅的多疑与尖刻，又看到了鲁迅的诚挚与坦荡。这构成了完整的鲁迅。我们更痛苦地发现鲁迅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强烈的防范意识，由此而领悟到《狂人日记》里“狂人”过度敏感的精神病态，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驱者（包括鲁迅在内）精神状态的一个侧面夸大的变形的反映。是这样的病态的社会环境：四面充溢着阴谋、流言和陷阱，人与人之间满怀敌意与猜疑，鲁迅精神上时时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他不得不“横站”，提防八方来敌，鲁迅之“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正是病态社会、病态人际关系对鲁迅心理、性格的扭曲与损伤，也是鲁迅的一种自我保护性的反应与反抗。

鲁迅曾经说：“现在有几位批评家很说写实主义可厌了，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³如今世人只知批评鲁迅多疑、尖刻，而不注意批判制造多疑、尖刻的病态社会，这同样是“万分古怪”的。对于我们民族最优秀的代表鲁迅心灵的这种损伤与曲扭，正是不合理的旧社会的最大罪恶之一。难道不应该这样提出并思考问题吗？

1 《集外集·关于杨君袁来事件的辩正》，《鲁迅全集》第7卷，第49—50页。

2 同上。

3 《译文序跋集·〈幸福〉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173页。

二

鲁迅在总结“三·一八惨案”的历史收获时说：“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¹我们由此而得到启示：鲁迅的多疑、尖刻是血的代价换来的，它绝不仅仅是消极的病态，还有其也许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评价的积极价值。它显示了从中国现代历史运动中升华出来的现代智慧：一种新的思维方法与战斗方法²。

在我们对以多疑、尖刻形态出现的鲁迅式的思维方式的丰富内涵作出分析、概括之前，对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生基础，以及由此表现出的鲁迅思维的某些特点，作一番探讨，也许是必要的。

鲁迅曾经对同时代的一位年轻的杂文作者作了如下评价：“‘此公’……看文章，虽若世故颇深，实则多从书本或推想而得，于实际上之各种困难，亲历者不多。”³这里确实存在两种思维方式：“从书本或推想”出发即从前人的实践经验或自我静观的抽象思辨中推导出观念的思维方式；重“实际”、“亲历”即从实际生活经验的总结概括提炼出观念的思维方式。鲁迅显然更推崇后者，因为这是更符合他自己的思想风格的。冯雪峰在他的有很大影响的《回忆鲁迅》⁴中就曾反复强调：“现实战斗的意志、需要

1 《华盖集续编·空谈》，《鲁迅全集》第3卷，第281页。

2 许寿裳回忆说鲁迅“观察很锐敏而周到”，谈话常“一针见血，使听者感到痛快，有一种涩而甘，辣而腴的味道”，朋友当面评为“毒奇”，鲁迅也“笑笑首肯”（《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33页）说的也是鲁迅的思维方式。

3 《书信·340414·致黎烈文》，《鲁迅全集》第12卷，第388页。

4 学术界对于冯雪峰这部著作的重要性也许仍然认识不足。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关于鲁迅思维方式、个性、气质的许多精辟见解至今仍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重要基础，本书的写作即从其中得到许多教益与启示。



和目的，决定着和统一着鲁迅先生的全部思想。和一个平常所说的思想家或理论家比较，他确实更像一个战士或一个斥候，一面战斗着一面探索着前进道路，而这个战斗和探索的经验与教训就是结成他的可珍贵的思想果实的基本东西。”¹这是一个对理解鲁迅思维特点有重要启示的论断。鲁迅正是恩格斯所说的“处于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²的时代巨人型的思想家，而非唯恐时代烈火“烧着自己手指头”的书斋里的庸人学者。最平凡的，也是最生气勃勃的人生形态对于鲁迅思维的发展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鲁迅最善于选择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心理习惯，作为他思想探索的开发口，一直开掘到历史的底层，揭示出深广的社会、历史、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你读读《坟》里的《看镜有感》《说胡须》《灯下漫笔》《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论“他妈的”》，每一篇都是开掘不尽的思想的深井，你会惊异于：几面古镜，几根胡须，饭后闲谈时的传闻，兑换钱币的心理变化，乃至几乎人人挂在嘴边的“国骂”，竟然蕴含着如此丰富的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心理学的内涵，体现着历史发展的本质。最平凡的，最普遍的，也是最深刻的，鲁迅与其说是运用逻辑的力量推论出历史本质的理性认识，不如说是运用了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人生、民族的深切体察，领悟到这一切，寓平凡与深刻为一体，表现了丰富而独到的人生智慧，这是鲁迅思维的一个重要特色。

作为一个思想家、杂文家，社会历史运动不仅是他思想的源泉，而且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原动力，鲁迅也从不讳言他的思维实践的社会功利的目的性。在鲁迅生活的20世

1 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56页。

2 [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5—446页。



纪，这种社会功利的目的首先表现为政治的目的。鲁迅无疑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在鲁迅身上没有半点远离政治的自命清高的文人气息，他时刻处于时代政治旋涡的中心，公开站在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这一边，从不掩饰自己与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反动政治的势不两立。在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以后，鲁迅更自觉地把从事的文艺思想领域里的战斗视为“最高的政治斗争的一翼”¹。关于文化思想斗争的战略、策略、方法问题的思考与探索，是鲁迅思想的中心问题之一。如果说政治学是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的重心所在，那么，在鲁迅的思想中无疑是集中了20世纪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政治智慧的。

鲁迅作为一个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战略家、策略家，他具有类似于政治家、军事家的绝端冷静的头脑。但鲁迅同时又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艺术家，他在对于人生、社会和民族命运的思考中，注入了强烈的主观情感，鲁迅说“释愤抒情”是他思考、写作的基本动力之一²。增田涉指出鲁迅思维的“多疑”与情感的“善怒”这两者的“结合”，显示了“鲁迅的特征”³，都是在提醒人们注意思想家鲁迅的诗人气质。它与前述战略家、策略家的气质构成了矛盾对立的统一。

鲁迅多疑、尖刻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20世纪以来空前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与思想斗争的产物。历史正经历着把陈旧的生活方式送进坟墓，新的婴儿诞生前漫长的阵痛，这是一个充满了污秽与血的时代，在生与死的最后搏斗中，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全部剥落，露出本来面目的疯狂与卑劣；古、今、中、外——人类历史、现实中的一切

1 《三闲集·文坛的掌故》，《鲁迅全集》第4卷，第122页。

2 《华盖集续编·小引》，《鲁迅全集》第3卷，第183页。

3 [日]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鲁迅回忆录》（下），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420页。